

##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对张之洞的情报活动概述

□ 陶祺谌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方面对张之洞进行不少情报活动,这是对清朝后方侦察的一个缩影,也是对华整体情报战争的一部分。日方情报主要包括张之洞的任职调动、对战事的北援、在辖区的备战等内容,因而从敌方视角形成了张氏在战争中较为负面的形象,体现在其援助战争前线不理想甚至有所保留、辖区备战不充分、未能与其他疆臣齐心抗敌等方面。日本获取的张之洞相关情报帮助军方加速战争进程,并借此摸清清朝后方战备力量。相比之下,张之洞在这场近代情报战争中的表现不尽人意,攻、防均不得力。

[关键词] 甲午战争;张之洞;日本;情报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3.014

[中图分类号] K25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7)03-0080-05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曾对湖广总督张之洞(1894年11月改署两江总督)进行不少情报活动,这是对清朝后方侦察的一个缩影,也是对华整体情报战争的一部分。关于该时期日本在华的情报活动,学界主要从个人、事件、区域等方面,对著名日本间谍<sup>①</sup>、间谍案<sup>②</sup>以及战争前线的情报问题<sup>③</sup>做了程度不同的研究,而较少注意日本对清朝后方督抚及其辖区的情报活动。本文拟对照中日双方已刊、未刊史料,论述敌方视角下的清朝后方战备情况以及由此呈现出张之洞的另一种形象,进一步审视这场情报战争中日本方面与张之洞的利弊得失。

## 1

近代日本对中国进行了大量情报活动,其政府、军方、民间均积极参与。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是日本对华情报活动尤为频繁的时期,开战之初便安排人员赴清朝沿江沿海要地侦察情况,在华日人陆续回国后情报活

动有所减少但并未中断。

地方督抚是日本情报活动的重要对象,其中张之洞因个人地位、综治区域等特殊性和受到日方高度关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对张的情报活动大体呈现以下特征。一是情报来源广泛。日本各方派遣间谍实地侦察是主要手段,此外还参考清朝刊行的各类报纸如《申报》《字林沪报》《字林西报》等,以及委托他国人员观察报告。后两种手段在多名日本间谍接连被捕后发挥一定作用。二是情报获取及传递及时。根据即时通信条件,相关情报常在数日乃至一日之内送达日本军方及政府。三是内容较为准确。前两点特征确保内容的可靠性,甚至出现不同渠道提供相似消息的情况。

具体而言,日本对张之洞的情报活动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张之洞的任职调动,因与战事息息相关而备受关注。1894年10月初清廷内召鄂督张之洞,有意让其入军机参与战争决策。时人对张氏入京抱有极大期望,认为“今日形势,非香帅无以挽回大局。此人之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项目(2016M590594)。

作者简介:陶祺谌(1988—),女,湖南郴州人,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①参见吴绳海、冯正宝:《宗方小太郎与中日甲午战争》,夏良才主编:《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冯正宝:《日清战争·辛亥革命期の宗方小太郎——「大陸浪人」の役割についての一研究》,《日本歴史》(494),1989年。

②总括性的研究,可参见戚其章:《甲午日谍秘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③参阅(日)小林一美:《明治期日本参謀本部の对外諜報活動——日清・義和団・日露三大戦争に向けて》。

用不用,我国家兴衰成败之所系也。”<sup>[1]18-20</sup>日本方面也敏锐意识到此事对清朝政局的影响,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清廷电旨下达的第四日已将情报转给朝鲜前线的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sup>①</sup>不过张之洞不愿入京,对此后清廷的催促仍多有犹豫。10月下旬日军越过鸭绿江,占领花园口、九连城。局势危急之下,清廷召刘坤一进京,改令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日本海军省所属在沪间谍及时报告,分析“辞任北京的国务大臣之职而任两江总督,无疑符合张之洞的兴趣。盖此职实际主掌扬子江的全谷地即沿江五省。”<sup>[2]</sup>张的兴趣所在也是日方重视他调任两江的原因。日本军方对长江流域的重要性有清晰认识:“清朝南部沿岸的首要防备为长江的防备。该江贯穿7省21府,全长约1500里,内地享其舟楫之利极广。盖清朝的物资,东南丰富而西北匮乏,而实赖长江以相济其有无,故其通塞与全国安危直接相关。”<sup>[3]43</sup>

二是张之洞对战事的北援,包括兵员和军需。张之洞任鄂督时,日本间谍注意到他派遣两湖军队陆续北上,或乘坐尚属轮船招商局的运输船“海琛”号和“广利”号顺江而下。署理江督后,张氏因曾任粤督亲历中法战争而颇为信任两广军队,数次请调江南及北上并支給粮饷及枪械,这在日本间谍的报告中多有体现。与此同时,日方还搜集不少军火制造及拨解的情报。汉阳枪炮厂本拟建成规模庞大的军工厂,日本对此极为警惕,曾多次指派间谍探察。但战争爆发前枪炮厂失火几成废墟,日人认为“实属快意”而不再留意于此<sup>[4]</sup>。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清朝首要军火制造基地,受到日方持续且高度的关注。日本军方及政府以实地侦察、与沪局员并联络等手段,获悉沪局主要弹药的制造种类、日均产量、军需运输的情况。南方兵员及军需的北援传统线路主要有二。一条为沿海线,运送船只出长江口沿海北上。但日本在海战中陆续取得优势、威胁大陆沿海,迫使清朝或将运输船换旗交归洋行或直接秘密委托洋行,将兵员及军需分开北运。一条为运河线,由吴淞口逆行或汉口、九江方面顺流至镇江,再经京杭大运河北上。为稳妥起见,两江负责的援送任务大多选择耗费更多人力物力及时间的后者。日本在华情报人员熟知此中情形,监视两条线路上各类运输工具的动静以及重要城市如上海、镇江、清江浦、天津等地兵员军需的变化。通过各地情报员详略各异的侦察,日本方面大体掌

握张之洞北援情形。譬如,张在鄂时陆续奏派吴凤柱、熊铁生、吴元恺等将率兵赴津,共计二十一营<sup>[5]206</sup>。拟定北上的鄂军总数,与日本海军省收到的在津情报大致不差<sup>[6]</sup>。

三是张之洞在辖区的备战。江防炮台的相关情况最早受到日本间谍报告。日本海军间谍曾报告张氏督鄂时期“热心辖区内的防御政策”,撤去浮标、增设炮台炮座,“施行所谓外形上的防备”,其目的“不仅是担心日军之侵袭,而是一为应对清廷关于各省严固防备的谕旨,一为预防哥老会匪的暴动”<sup>[7]</sup>。日方对长江下游各炮台的侦探更具针对性。吴淞炮台既为上海门户,亦是长江防备之前哨,谍报中数次出现该炮台增员添炮、聘请德人指导等内容。张之洞抵达两江署任刚满一月,即出省查阅沿江沿海炮台、布置营伍,所到之处包括江阴、上海、镇江等地。日本情报人员持续报告张的行程,注重吴淞炮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以及镇江两岸炮台的视察情形。例如,日本战时大本营收到的情报中如实摘录《申报》关于张之洞检阅镇江炮台的报道:张指令驻防镇江的统领陈湘基“整备添兵,以固防务”,并安置“由德国兵舰运到新式大炮四五尊、格林炮六七尊、快炮十数尊”于炮台,但略去了该报对该炮台防务的溢美之词<sup>[8]</sup>。南洋水师的活动是日本情报中另一项格外留意的内容。在7、8月间日本军方已数次派员赴吴淞实地侦察,探知南洋水师消极备战,虽有派遣军舰北上的计划但未执行;甚至有官兵散发日本海军南侵的消息,假以南方不稳而“避开北洋之招呼”<sup>[9]</sup>。因而日本在战后的一段时间内对南洋水师的情报活动渐减。不过随着战事发展,日军占领旅顺半岛后拟海陆军配合、集中力量与北洋水师作战,威海卫之战后便计划分拨海军入侵台湾<sup>[10]287-288</sup>。为防止南洋水师支援北方以及后期阻扰日军南侵,日方从1894年底起连续探察南洋舰队的日常停泊及异动。次年2月,日人注意到张之洞聘请外国顾问并着手改革南洋水师:“胆怯不适任的士官悉被罢免,募集训有素的外国士官袭任。此舰队预计在3月初准备完毕,将与敌人试一决战。其司令长官由吴奇勋任之。”<sup>[11]</sup>此外,日本在华间谍零散报告张氏在辖区的其他备战活动,包括发布告示悬赏退敌、在辖区各要地聘请外人、架设上海及川沙厅南汇县之间电线等事。

①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致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电》(1894年10月12日),《1. 清国軍隊、軍艦ノ移動並情況》,5-2-18-0-8。按:原文无标题、编号的日文档案,按收发关系以中文拟出标题,下同。

如 1895 年初,上海道台刘麒祥遵照张之洞电令,在“吴淞、崇明、上海、川沙各营遍贴,勿论军民人等,如有助战得胜者,皆不吝赏”<sup>[12]194</sup>。不到半个月,该消息已被日方清楚掌握<sup>[13]</sup>。概言之,由于长江中下游战略地理位置差异及战争局势变化,日本偏重张之洞在两江的备战情报,并在战争中后期加大搜集力度。

## 2

从敌方观察视角形成的情报内容,呈现更多的是张之洞较为负面的形象。

首先,张之洞对战争前线的援助不理想,甚至有所保留。在日方情报中,两湖、两江派往北方的士兵存在大量“军纪不严”“无勇敢之气象”的弊病,甚至发生新募兵士北行途中纷纷脱逃的现象。这是清朝旧式军事制度的产物。更有甚者,张之洞对中央的战争支持有所保留。黄海海战后,李鸿章虑及北洋各船修理需时、海口防务紧急,请调南洋水师三只主力舰北来助剿,但遭到时任江督刘坤一的拒绝<sup>[14]35</sup>。张之洞到宁尚未接篆署理江督,便收到李鸿章对南洋兵轮的再次请调。张实际与前任刘坤一持相同态度,但不愿贸然与清廷及李鸿章抵牾,背负北援不力的指责,而是采用两面手法。张之洞虚以拖延李鸿章,先致电总署解释南洋四轮“皆系木壳,管带既非出色,炮手又甚生疏”“若出海攻战,万难得力”,并在尚未与李商妥的情况下强调已“与北洋电商,北洋亦深知其无用”而获清廷理解<sup>[15]411</sup>。随后,他以清廷应允为由驳拒李鸿章:“南洋四轮断不能派往北洋,已电奏奉旨依议”<sup>[12]178</sup>。其时,日本军方密切跟踪南洋水师的动态,在张之洞拒不派舰后不久根据某外国人的谈话获悉“南洋舰队虽已受命应援北洋,但未有一舰出洋,主因是其乘组舰员不充实”的情报,是年 12 月底进一步确认南洋舰队全部停泊在长江下游沿岸<sup>[16]</sup>。10 年后日本参谋本部编纂战史仍对张氏举措予以尖锐批评:南洋水师不愿北上是因“看见清朝水师精锐之北洋水师于黄海的败绩,畏惧露怯,远溯长江上游屏息”;而张之洞也“以援护南洋沿海各口的巡防及炮台为口实”拒绝李鸿章的求援<sup>①</sup>。日方批评张之洞是“秦越

肥瘠漠不相关”,这与此后清廷因枪枝截留问题申饬张“反以江南为前敌”“实属不顾大局”之意颇为相似。

其次,张之洞在辖区的备战也不充分,突出表现在战略要地的防备薄弱。1894 年底上海各地盛传日军不日南侵,局外国家某人致信建议日本军方从长江北岸登陆,直取江阴、南京等地,并附上长江入海口北的军事设施图,具体标明南洋舰队、水雷、新设炮台的位置<sup>[17]</sup>。此时张之洞也收到日本第三兵船将扰南洋的消息,致电总署强调自己“到任止一月,筹办军务,昼夜不遑”,并向清廷坦承“崇明以北,入江之路向未设防”<sup>[12]415</sup>。张氏所言有推责之嫌,但他对长江入口防备薄弱的焦虑可印证日方情报的判断。此外,日本间谍关于张之洞检阅吴淞炮台“试验射击,一发都未命中”的报告<sup>[18]</sup>,也基本符合事实。许同莘曾直言,张氏巡阅江口时“设靶江心,命台舰同时发炮,命中亦少,知江防不可恃”<sup>[19]408</sup>。江防薄弱的情形导致当地上下对待战事的态度消极。在日本间谍眼中,张之洞亲自巡检几处江防重地并未尽职尽责。上海发出的谍报称:张从吴淞乘坐炮舰溯流巡检江南制造总局及距该地 3 里左右的龙华火药制造所,但炮舰“停泊在该兵器制造所附近的河中。总督只是在甲板上看了一下四周便进入船内”;在火药制造所“总督仅见其烟囱”。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观察到两江官民对待战事都很悲观,张之洞“看上去很恐惧(日军)在上海登陆之事”,而当地清军“日日逃亡”<sup>[20]</sup>。

再者,张之洞未能与其他疆臣齐心抗敌。1894 年 10 月中旬日本军方收到天津发来一份较为特殊的谍报,内称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员运送慈禧太后六旬庆典的贡品,目下已抵天津,贡品包括笔、墨、纸、枪、炮和火药<sup>[21]</sup>。三个月后,天津方面对此事进行补充:张之洞的贡品价值百万两,为后膛野炮 108 门,配有炮车等配件以及相当的弹药,“是现今形势下独一无二的好贡品”;不过,张听说李鸿章有再掌清朝全权之倾向,后悔将这些价值不凡的物品送往天津,其进呈的深意是欲供给吴大澂直辖的军队,若“此军火落入其竞争者之手,难免遗憾”<sup>②</sup>。限于史料,张之洞献呈的贡品具体为何尚不能证实或证伪<sup>③</sup>。不过,日方情报反映的张之洞相关人

①(日)参谋本部编纂:《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第 3 卷,第 266 页。因日本参谋本部编撰史料时距战争结束为时尚短,相关材料偶有错误:南洋水师被令调动的的时间有误,且将张之洞刚署江督的情形误记为刘坤一。

②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1 月 14 日 天津通信 劉坤一、張之洞、吳太微等の言動》(1895 年 1 月 14 日),大本营 - 日清戦役雑 - M27-30-142。按:“吳太微”系吴大澂之误。

③茅海建先生曾对此问题有专门研究,于档案中也未见具体贡品,详见《张之洞的别敬、礼物与贡品》(《中华文史论丛》2012 年第 2 期)。吴大澂于 10 月 31 日致电张之洞称“贡品进呈,天颜有喜,以后湘邀优眷,堪慰垂念”,茅先生推测“贡品中很可能有价值连城的精品”。若联系半个月前的日方谍报,似与吴电有相通之处。



事关系及矛盾确实存在。张之洞与吴大澂关系密切,并于1894年11月结为亲家。战争爆发不久,时任湘抚的吴大澂自请赴敌。张之洞对吴氏予以力所能及的援助,将北援鄂军的大半奏请归吴调遣,署理江督后对相关营勇饷械甚至情报优先供给吴。然而吴大澂以书生掌兵,于战事并无帮助。李鸿章曾直言“吴清卿中丞奉命会办北洋,清卿人本平正,颇能和衷,惟平素不甚知兵,凡事悉由鸿章主持,未见赞助之益”<sup>[22]42-43</sup>。相反,张之洞对战事前线核心人物李鸿章充满不信任,战时拒调南洋兵轮、北援偏重吴大澂等事即是明证,战后亦有处处针对李氏的举措或传闻。张之洞作为清朝军备供应的后方疆臣与李鸿章产生龃龉,加深了日本方面关于清朝上层不和、不能同仇敌忾的印象。

### 3

情报是军事活动的重要依据。甲午战争期间日本获取的张之洞相关情报,曾为日本军方加速战争进程发挥作用。1895年1月中下旬日军已登陆山东半岛,准备围攻威海卫。两江援调的步队李占椿军5营、万本华军5营、张国林军5营以及马队陈凤楼军5营共计20营,遵照清廷旨意前赴山海关,尚在途中。张之洞见威海情形危急,于22日致电总署,建议江南20营以及将抵沂州的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军4营“由沂州府折而东北行,出山东省城之南,取道莒州等处,直趋烟台,探明威海后路,相机援剿”<sup>[15]419-420</sup>。次日,此议获清廷允准<sup>[23]229-230</sup>。不久,日军截获相关电报,推测上述营勇无疑是威海卫的增援军,由此加快对威海卫港内的扫荡,并在援军到来之前歼灭北洋水师,避免背腹受敌的危险<sup>[24]180-181</sup>。当然,日本方面更多是借张之洞相关情报,摸清清朝后方战备力量及补充能力,从而整体把握敌方的军事实力。比如,在战争中前期各类商用、军用船只将清朝南方兵勇、物资沿海岸线运往北方,上海、海州、天津等地尤为繁忙。这些情况频繁出现在日方军事情报中。日本通过在清朝北部重要港口外围海域临检、定期巡航北方沿海等方式对清朝的北援船只有所威慑,但未能完全封锁北方海域,对南方沿海尤其是大陆援台的限制较少。不过,日本在结束威海卫之战后已全面压制北洋海面,战时大本营立即训令联合舰队南进南洋“拟全占彼海上主权”,并先行占领澎湖列岛“以此地为根据,压制马鞍群岛以南海面”<sup>[25]</sup>。这也是日本军方对相关情报给予的回应与措施。

相比之下,张之洞在这场情报战争中的表现不尽

人意。战争伊始,张之洞意识到日本情报人员在华活动的危害性,尤为注意剃发改用华装的日人,“如查有华服倭人,即照奸细拿办,切嘱美领事不得袒庇,庶免混迹内地,泄我事机”<sup>[12](P156)</sup>,并数次在辖区内查拿可疑日人。不过,日本的情报来源并不只在华日人一端。张之洞鲜少提防其他国家在华人员与日本方面的通信。日本军方曾收到在上海某欧人来信,证实1894年底英国舰队进驻舟山群岛一带、南洋水师停留吴淞附近并未远航的情报<sup>[26]</sup>。类似情况常有发生,甚至有在沪外人主动向日本军方提出,可介绍熟悉中国北部海岸、长江及吴淞口的领航员,并已有一名“能为贵国船只考虑”的领航友人<sup>[17]</sup>,以帮助日本海军进犯长江。此外,张之洞对当地中外报纸报道战事相关动态、细节也缺少管理约束。如1895年2月初日本军方注意到《字林沪报》关于北援的两江军队直赴威海卫救援的报道<sup>[27]</sup>,可为日军截获的相关电报作一参照。可见,张之洞存在警惕日本侦察情报的意识,但防范范围过窄。

情报战争本有攻防两端,若从更高要求来看,张之洞在收集敌方情报方面的作为也难有实济。战争期间,张之洞因掌握军政消息迟缓而选派委员赴威海坐探“务探确情,随时发电”,并与在京友人、驻外公使、前线要员如吴大澂、李秉衡等人随时保持电报联系。这些举措都可视为情报收集,但与近代意义上的情报战争还有不少距离。军事情报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具有严密的组织性,“任何情报活动都是通过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进行”<sup>[28]15</sup>。但张之洞的情报收集活动更多是针对某个事件临时应急设立,缺乏持续性,更谈不上制定条规以规范机构、培训专人。这导致张氏无法及时了解战情、深入分析战局,继而影响具体决策。例如,1895年2月张之洞电商台湾巡抚唐景崧,以“南洋不久必有战事……台湾止一兵轮,万无海战之事”请调南琛舰长回两江<sup>[12]241</sup>。其时,日本战事大本营已拟定夺取澎湖列岛的作战计划,但张氏作出的判断与日方的实际行动恰好相反。

战争的结果与军事近代化紧密相关,情报活动即属其中一部。张之洞在甲午战争期间积极备战,在地方督抚中表现突出,这是既往史料论著对他的基本认识。即便如此,张氏在这场近代情报战争中仍处下风,攻防均不得力。这并非张一人的问题,反映的本质是清朝军事制度亟待变革。

#### 参考文献:

[1]林开明等编.北洋军阀史料·徐世昌卷(1)[Z].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 [2]上海通信者致海军省电,1894年11月[Z]//上海通信.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雜報告-M27-2-2.
- [3]参謀本部編纂.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戦史:第1卷[Z].东京:東京印刷株式會社,1904.
- [4]上海出張員報告,1894年7月14日[Z]//上海及吳淞の景況.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日清-M27-10.
- [5]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3)[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
- [6]天津通信,1894年9月29日[Z]//9月30日天津通信.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雜報告-M27-1-1.
- [7]海军大尉黒井悌次郎致海军省电,1894年9月19日[Z]//大海報第6号 明治27年9月19日 清国兵備に関する現況概略 黒井海軍大尉報告[Z].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大本營-日清戦役雜-M27-30-142.
- [8]獨國軍艦兵器ヲ清國ニ送付ス,1895年1月8日[Z]//清国政府の軍艦水雷艇兵器彈藥類の購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日清-M27-13.原文見:潤州防務[N].申报,1895-01-09(2).
- [9]上海派遣員報告,1894年7月11日[Z]//上海及吳淞の景況.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日清-M27-10.
- [10]海軍軍令部編.二十七八年海戦史:下卷[Z].东京:春陽堂,1905.
- [11]南洋艦隊,1895年2月21日[Z]//A 清国南北洋の艦隊戰略司令長官の命令(1).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日清-M27-9.
- [12]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8)[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
- [13]1月7日 在清某通信,1895年1月7日[Z].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雜報告-M27-2-2.
- [14]北平故宫博物院編.清光绪朝中日交渉史料:第21卷[Z].北京: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
- [15]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4)[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
- [16]清國艦隊ニ関スル件,1894年12月2日[C];南洋艦隊ノ處在,(1894年12月26日[Z]//B 清艦の移動、所在、拳動状況(5).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日清-M27-9.
- [17]12月26日 上海通信,1894年12月26日[Z].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雜報告-M27-2-2.
- [18]十二月廿一日 在清某通信,1894年12月21日[Z]//12月9日 天津通信ほか.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雜報告-M27-2-2.
- [19]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 [20]12月22日 上海某より来電,1894年12月22日[Z].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大本營-日清戦役雜-M27-30-142.
- [21]十月十五日 天津通信,1894年10月15日[Z]//9月30日 天津通信.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雜報告-M27-1-1.
- [22]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36)[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 [23]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2)[Z].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4](日)参謀本部編纂.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戦史:第6卷[Z].东京:東京印刷株式會社,1904.
- [25]訓令,1895年2月14日[Z]//大本營の命令訓令情報(2).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日清-M27-1.
- [26]在上海欧人某氏ノ来簡抜粹[Z].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雜報告-M27-2-2.
- [27]清兵ノ移動,1895年2月4日[Z].C 配兵及軍隊の移動.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日清-M27-9.
- [28]闫晋中.军事情报学[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文 嵘